

何启生平事迹纪略

杜 国 彪

南海县籍旅港人士何启，是清末民初的一代名人。

在香港的历史上，何启是第一个合格的华人医生，第二个获得最高法院允许的华人大律师，第三个参加香港立法局非官职的华人议员。从1890~1914年，何启任立法局议员长达二十四年。他在香港做了很多有益的公共事业，其特殊贡献有：将西方医学技术，有效地介绍到中国。1887年，他在香港创办了雅丽氏医院 (Alice Memorial Hospital)，香港西医书院 (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)，并协助创办香港大学 (The University of

Hong Kong)。 (香港大学开办后, 香港 西医书院成为香港大学的医学院); 他重视香港的中文教育, 提倡中英文并用, 创办了中英文并重的圣士提反 (男) 中学; 始创了启德机场, 为香港航空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他对香港社会的文化和公共事业, 有过重大的贡献, 是香港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。

何启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位热心的支持者。他是香港西医书院的教师, 而孙中山是书院第一期的学生, 由于这种师生关系, 他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, 掩护了兴中会在香港设立的据点。他以一个兴中会的会外人士, 参与广州起义的策划部署, 并作为兴中会对国外的发言人, 为革命作出了贡献。在此之前, 他与胡礼垣合作, 曾经写了一些有关改良主义的文章, 发表在国内外的报刊上, 对国内的政治思想有过不少影响。

(一)、家 世

何启原籍广东省南海县西樵镇南沙村，（该村曾属海洲乡管辖）。何族落籍到这风光秀丽的西樵山附近村庄，已有悠久的历史，到何启已是第十九世子孙。祖父何荣昌，字碧中，因生活所迫，出洋谋生，到南洋麻六甲工作，在摩利臣牧师开设的雕板印刷厂当工人。摩利臣是基督教徒，在麻六甲传教，开设英华书院及印刷厂，兼印刷书籍报刊，曾出版世界上第一份华文报刊，名叫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》，用木刻华文方块字印刷，是基督教会所办刊物。

何荣昌到麻六甲工作后，经常寄钱返家。他生有二子：长子润养，字福堂，号进善。次子润祥，字瑞堂，号庆云。何福堂就是何启的父亲，生于1818年（清嘉庆二十三年）。何荣

昌离家时，何福堂年纪尚幼，在家随母亲生活。年纪渐长即辞别母亲，往麻六甲探视其父，后听从父命，在麻六甲留下，肄业于摩利臣牧师设立的英华书院。这是一间采用中、英文教学的教会学校。何福堂于二十一岁时，听随父命，加入基督教，接受洗礼。毕业后，曾伴随摩利臣之子赴印度首府加尔各答，肄业于主教书院一段时间，返麻六甲后，仍回英华书院工作。与该校教师理雅各博士相处甚密，师徒甚相得，共同研究圣经、神学、世界历史、教会史……等科。其时，何福堂的英文已有相当造诣，可以纵览各家著述。理雅各博士更授以希伯来希腊文字，未几，亦能朗诵原文课本，于是在学校兼任助教职务。

1843年，基督教伦敦传道会总部由麻六甲移至香港，英华书院亦随同迁移，教会派何福堂与理雅各博士主持校务。到香港后，何福堂

乃与早已按旧俗在乡中定婚的黎氏结婚。结婚时，何福堂原拟回家完婚，但反对沿用旧俗。因与乡中长辈约定，采用新式简单结婚仪式，乡中长辈佯为答允。待何福堂回乡后，乡中长辈一反前约，要他事事从俗，一切仪式均沿旧礼。何福堂坚持反对，连夜返回香港。乡中长辈没法，遂送黎氏赴港成亲，婚后定居于香港。

1845年，何福堂当了牧师，主持基督教伦敦传道会会务。他长于交际，善于辞令，且关心当地经济生活，了解地产市道。香港开埠初期，地产价值很贱，他看准时机，从1846年开始投资地产买卖。初期仅以150元代价在中环商业区购买了一幅地皮，后来地产升值获了巨利。1862年，他以26,325元巨款投资购买了卜一幅社团地皮，大搞地产买卖。有了大量金钱，又用以收购田地贷款牟利。据乔亚先生（G.H.

Choa) 1979年11月19日写给柯路先生 (Mr. Arnold · Hall) 的信反映：根据何启夫人遗嘱，申请检查何福堂遗产时，就查出有这样十一项收据：

(1) 1857年的一张收据，用钱70两买地一块。

(2) 1860年的一张收据，用钱30两买屋一间。

(3) 1862年的一张收据，用钱7两买稻田一块。

(4) 1866年的一张收据，用钱 $17\frac{1}{2}$ 两，买稻田一块。

(5) 1866年的一张收据，借出钱17两，注明每月利息20%。

(6) 1869年的一张收据，借出钱20.08两，每年收回利息2.04两。

(7) 1871年的一张收据，用钱30两，买

地一块。

(8) 1871年的一张收据，用钱36两，买稻田一块。

(9) 1875年的一张收据，用钱100两，买地一块。

(10) 1878年的一张收据，用钱13两，买稻田一块。

(11) 1890年的一张收据，用银洋80元，买地一块。

以上均是何福堂与当地村庄人民做的交易。后三项，收据署名为何进善堂，那时何福堂已去世，当是家族所为。

何福堂在香港期间，财富不断增大，能够用巨款供给儿子女婿出洋求学。

1871年，何福堂病逝，遗下资产达港币10万元（当年的港币10万元，超过今天在香港100亿元的地产购买力）。因他生前经常怀念

故土，死后葬于南海县西樵山的石头岗（又名饭盖岗）西向。妻子黎氏逝世后，亦葬在西樵山的百鸟归巢半山上。

何福堂生有七子六女（早殇者不算为五子六女）。七个儿子是：神赐、神添、神光（早殇）、神保、神启、神宁（早殇）、神祐。第四子神启便是何启，年长时省却神字辈称。

（二）、求学时代

何启字迪之，号沃生，生于1859年3月21日。年幼即勤奋好学，跟英籍私人教师攻读。当年学龄儿童入学，按照香港政府规定，须先读私塾数年，然后考入官办的中央书院。（1894年改名为皇仁书院，1885年孙中山先生曾入读该校）。开始时一般读第八班。何启自幼聪明勤学，英文基础甚好，数学成绩优良，

1870年考入中央书院时竟连跳四级，进了第四班。那时代，香港中央英文书院的学制分为八班：由第八班读起，到第二班毕业，第一班为大学预科。和香港今天的学制比较：第八班相当于今天英文小学的五年级，第六班相当于初中一年级，第四班相当于初中三年级，第二班相当于高中三年级。何启考入第四班时年仅十二岁，修业了一年，为求深造，即于1871年九月赴英国留学。先在根德郡的巴芦麻学校（Palmer House school）继续攻读，1875年预科毕业，考入鸭巴甸大学（Aberdeen University）攻读医科，这是英国的名牌大学之一。何启的学业成绩超群，攻读了三年，考获医科学士学位，第四年取得外科硕士衔。年轻的何启，取得两个学位后，离开了鸭巴甸大学。

其时，学业超群、风度翩翩的何启，结识

了一位英国贵族华尔登 (John Walkden)，
的女儿雅丽氏 (Alice Walkden)，彼此相
爱。在雅丽氏的鼓励下，已有医生资格的何启
再读法律，以为将来从政的准备，遂于1879年
进入英国林肯法律学院 (Lincoln 'a Institute)
深造。1881年获得高级法律学士的学位，取得
大律师资格。毕业后，在伦敦与雅丽氏小姐结
婚。当时华人与外国女子结婚甚为罕见，何启
在这方面打破了传统习俗。婚后不久即同返香
港。这时，何启的年龄不过二十三岁而已。

(三) 医生、律师、局绅

1882年何启回到香港。当年香港总督轩尼诗 (Sir · John Pope Hennessy) 一次在立法局致词，当众夸奖他的学业成就，称赞他为香港华人的精英。因此，何启刚抵香港便立即当上太平绅士。

何启返港初期，从事医生业务，挂牌行医，为香港第一名华人执业的西医医生。但当时群众的医学常识缺乏，对西医的愚昧未除，有病只找中医，甚至求神问卜，完全不信任西医。他的医务所几乎没有病人就诊，真是门堪罗雀，无法再干下去，很快就宣告歇业。于是，他改行从事律师业务及政务，成为香港的第二名华人大律师——第一名华人大律师是何启姐姐何妙龄的丈夫伍廷芳博士。

1886年，何启被香港政府任命为洁净局

绅，稍后被选为保良局绅及团防局绅。

(四) 创办雅丽氏医院

何启虽然不当开业医生，但在医学领域，他有两个较大的贡献。为了使中国人能够接受西方医疗技术，他考虑到两个问题：首先是建立更多的西医院，用西方医疗技术，较大规模地为中国人治病；另一方面，要创办医科学学校，将西方医学传授给中国青年，培养中国的西医医生。

1843年，基督教伦敦传道会在摩利臣大厦 (Morrison Hill) 开办了一间医院。洽臣医生 (Dr. Bengamin. Hobson) 在那里负责，头二年治疗了七千病人，其中有 1,200 病人住院留医。1848年洽臣医生迁往广州去了，柯士波医生 (Dr. H. G. Hirshberg) 接替其职务，在医院工作了五年，1853年派往厦门去了，工

作全部停顿。1881年重新开业，建立了一个小型的领导委员会，由戴维斯医生（Mr. H. W. Davis）任主席，决定在太平山地区，开办一间慈善性质的西药房，定名为那打素药房（Nethersole Dispensary）。戴维斯的母亲巡视了药房，鼓励委员会着手考虑建立新医院。于是迅速将那打素西药房，扩大为诊所。委员会扩大成员，吸收中国人以及非中国人的有代表性团体和人物参加，其中就有何启。这时，他的妻子刚逝世。

原来，何启与雅丽氏结婚后感情甚笃，不久生下一个女婴，送返英国由外祖母抚养，不幸夭折。雅丽氏伤心过度，忆女成疾，于1884年6月8日病逝，终年三十三岁，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。他们结婚前后不满三年，深爱妻子的何启既不想承袭她的遗产，又深深感到具有完善设备的医院的重要。为了纪念妻子、造福

人民，将亡妻的遗产捐献作建筑费用，创建雅丽氏医院。

在创办雅丽氏医院时，当年香港的西医院只有两种：一是政府医院，作风太洋化，华人不容易接受。一是慈善性质的东华医院，管理及设备均未达西方医院水平。雅丽氏医院的创设，就是要给华人提供现代化的医疗服务。

何启将亡妻遗产创办医院，用2万元于荷李活道的75~81号购地一幅，但创办医院需款甚鉅，何启即与香港基督教伦敦传道会领导商议，伦敦传道会拨款14,000元建筑楼宇。一位葡萄牙——印第安人血统的地方慈善家庇理罗士（Mr. E. R. Belilios）捐赠5,000元，购置药品设备。

何启创建的医院，于1887年2月26日开幕，命名为：雅丽氏医院（Alice memorial Hospital），又一英文名称为（Alice and

Affiliate Medice)。初期设病床80张，后来增加到90张。关于医院董事会的设立，和医院的管理工作，何启指定交给基督教伦敦传道会负责。经常费用则由伦敦传道会及各方捐赠维持，并由支持者们组成以何启任主席的财政委员会，协助筹集资金。

医院开办后，由于设备完善，院内医生技术水平高，因此，为中外人士所重视。在雅丽氏医院开业六个多月后，孟生医生（Dr. Patrick Manson）在香港西医书院落成典礼的庆祝大会上致词时，就赞扬了雅丽氏医院。他说：

“……香港从1841年起成为英国殖民地，人口及市场的繁荣，都在迅速地增长。为中国人治病的医院，虽然经过几年来的创办，数量急剧增加，达到港口和（英）国内许多市镇的要求；但长期以来

还未能从物质和文明方面创办出为中国医疗导向的、专心为中国人治疗的一间医院。敦华医院（Tung Wak Hospital）的领导者们及拥护者们，在怎样创办医院这个问题上，不是立足于当地水平，无论是医院章程、治疗方法和管理办法，都全部不适应当地群众的要求。而香港政府办的市民医院，还加上带有仁慈的联想——这是多么僵硬的外来的方法。这些医院令当地人不喜欢，对当地人（在精神上）没有吸引力。经过长期的尝试与摸索，直至今年二月，雅丽氏医院的落成，才得到答案。雅丽氏医院开业不到一个月，病床立即满额，不少病人走到门诊部来治疗。这就是医院领导有方的明证”。

雅丽氏医院初办时只有五间病房，八十张病床，后来病床增至九十张，仍需进一步扩

展。但是，医院附近的荷李活道已没有地方可以发展。而在般含道（Bonhan Road）却有一个场所，这就是基督教伦敦传道会在太平山街开设的一间诊所。雅丽氏医院创办后，引起了戴维斯医生（Mr、H、W、Davis）对创建医院的兴趣，他捐赠了将诊所改为医院的所需资金，增设了三十五张病床，为纪念其母亲那打素女士（Methersole）1893年将诊所改名为那打素医院。

雅丽氏医院与那打素医院双方都在基督教伦敦传道会的领导之下，在工作上是互相合作的。那打素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妇女和儿童。在妇科方面，由于何启逝世前的大力支持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1903年，那打素医院增建了一座楼房，作为妇产科专用，变成雅丽氏医院的妇产科留医部。

1906年，另一间医院开设在那打素医院后